

基于宏观文化心理学视角的心理能力研究^{*}

[美] 卡 尔 · 拉 特 纳

摘 要 宏观文化心理学为解释心理能力的差异提供了一种新解释。该理论将心理现象视为文化现象，其基础、特质、水平、社会化和人口统计学分布均来自宏观层面的文化要素，诸如制度、文化产品及文化概念等。美国主流文化和少数族群亚文化所展现的语言表达能力（论述能力）的案例研究，进一步解释了语言能力如何才能增强，以及心理上的提高如何依赖于改革心理学得以形成的宏观文化要素。心理科学和社会改革是相辅相成的，理解心理能力涉及它们是如何获得、评估和增强的，这些问题延伸到儿童抚养、教育、医疗和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对心理能力的心理科学研究因此具有广泛的意义，但是其不同的科学方法有着不同的社会内涵，考察其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宏观文化心理学 心理能力 语言能力

作者卡尔·拉特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化研究与教育研究所主任。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2-0049-08

一、宏观文化心理学

宏观文化心理学是一种综合的、连贯的和普遍的心理学理论，它认为心理现象在本质上是文化现象，强调心理现象起源于宏观文化因素，并体现、表达和传播了这些因素，同时，它还被这些因素构造和社会化。宏观文化因素是建构心理学的原动力。正因为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起源和特质，不同国家和亚文化的心理学（心理能力）才各不相同。

宏观文化因素包含社会制度、文化产品（如工具、技术、学校、书籍、枪支、服饰和财产等）和文化概念（如关于精神疾病、愉悦、爱、女性气质、隐私、财富、自由、社会责任、宗教、科学和美的概念等）。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日本的饮食失调现象增加了 600%，这是宏观文化心理学的例证之一。要想解释这种心理问题何以迅速传播和增长，宏观文化心理学是唯一的途径。若无某种主流文化的推动和引导，千百万女性的个人因素不可能恰巧自发地、同时地、迅速地显露出来。宏观文化心理学可以揭示产生了诸如饮食失调这种心理学现象的特定文化要素。

类似地，在世界范围内，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是结构性的性别问题的函数，这些问题包括诸如政治赋权、经济参与和机遇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中的性别平等与数学能力上的性别平等的各种测量具有约 0.40 的相关度。（在对 136 个国家的性别平等进行的测量中，美国排名 23，巴西排名 62。）这个例子表明了特定的文化因素——性别的社会不平等——对性别的智力不平等的有力影响。这比简单地把心理现象与某一民族

^{*} 本文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王波、丁紫瑄翻译。

国家联系在一起来得更具体,不过具体的形成过程仍未明确。

宏观文化心理学更为具体和富于启发的例证当数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中国人自我观念的转变。这个例子不仅呈现了宏观文化因素对某种重要心理学现象的激发、支持、规定、建构和社会化,而且揭示了其中的机理。

首先要注意,对中国人个人主义的传统阐释并非基于宏观文化的视角:传统上认为,子女的个数对养育后代有着内在的、自然的影响。“与祖辈的大家族不同,现在家庭中的子女变少了,小孩与照料者之间就有了一对一的个人联系。每一个成人照料者都卷入了与孩子的情感联系。”这种情感上的卷入自然会导致父母对孩子的各种要求来者不拒,并渐渐宠坏了孩子。^①但这种解释遭到了现实的反驳,以上逻辑链条的各部分并不是自然关联的。独生子女并不一定会对他们的小孩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而且强烈的情感联系也并不一定会纵容和惯坏孩子,这种状况也不一定就会降低家长或长辈的权威。对可能导致父母对独生子女溺爱的文化因素的忽略都会使上述解释看起来像一种自然推动的结果。

相反,对中国人个人主义的宏观文化心理学解释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体制(银行、传媒、意识形态、广告、就业等)和社会领导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鼓励的规范性活动中。“消费的世俗和商业化的活动产生了具体的内容、形式和特定的空间,使新‘个体性’的出现成为可能。”^②而这都是政府刻意培养的结果。Yan表明,“个体地位的上升与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个体化,应当被看作是中国举国谋求现代化的一种反射”,“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三大改革分别是住房私有化、教育市场化和医疗市场化。体制的变化迫使个体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承受更大的风险,同时也变得更具反身性(reflexive)。被迫个体化的方式之一,就是使千百万国有单位的员工下岗、被迫下海谋生。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在1998年到2003年间,超过3000万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占国企员工整体的40%。一旦失去了工作和安全感,下岗工人的生活立即改变了”。^③Yan表明,心理学是各种历史力量的产物:“过去的三十年间,随着生活状况和人生轨迹的剧变,中国人的个体在主观领域也经历了同样激烈的突破,亦即自我的重构和对个体身份的寻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革新、教育和职业生涯的发展等一起导向了尼可拉斯·罗斯(Nicolas Rose)所说的‘事业型自我’,即中国年轻一代中普遍存在的精打细算、积极主动和严于律己的自我概念。”^④这种文化诱导导致的自我概念的改变为中国人带来了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和它在西方的表现是一样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塑自我的压力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一种额外的责任,与之相伴的还有新的心理负担。个体中国人被挤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日益减少的来自家庭、亲属和国家的支持之间,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⑤

政府有计划地在法律和经济上支持私有的商品房项目,以此创造了个人主义的中产阶级。第一个此类项目完成于1997年的北京,其设计和施工都是为个体化的富有个人量身定做的。国有银行向个人发放抵押贷款。这种社会工程助长(设计)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排外的自我概念。^⑥

虽然工作单位依旧存在,但随着改革的加快,其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员工和雇主现在可以进行“谈判”,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双方做出的承诺都在减少,这就使得年轻员工的心态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对个人和家庭(常是核心家庭)生活福祉的考虑优先于其所在的更大的团体或职场的考虑。^⑦

另一个推动个体主义自我转变的宏观文化因素是政府制定的鼓励购买私人汽车的政治经济决定。这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制定的重大政策鼓励就自己的便利出行的个体主义方式。同时该政策推动了个体主义消费观的出现,人们在买车时会强调汽车的个体主义风格以适应他们的个人气质和要求;而且它也催生了个体的地位意识,个体通过昂贵的豪车来展现他们的经济地位。不过,新生的汽车文化也加剧了严重的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而所有这些本可以通过完备的公共运输系统和城市规划来避免的。

① Goh, E. & Kuczynski, L., “Agency and power of single childre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urban Xiamen, China”, *Culture & Psychology*, 15, 2009.

② Yan, Y., “The politics of consumerism in Chinese society”, In T. White (Ed.), *China briefing, 2000: The continuing transformation*, 2000, Armonk: M.E. Sharpe.

③④⑤ Yan, Y., “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2010.

⑥ Tomba, L.,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51, 2004.

⑦ Ng, E., “Heartache of the state, enemy of the self: Bipolar disorde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urban China”, *Culture, Medicine, Psychiatry*, 33, 2009.

宏观文化心理学对中国人自我概念的阐释借助了现实的、具体的、引人注目的和重要的社会结构、社会政策、政治、物质产品（住房）和文化概念，以解释、描述和预测中国人自我概念的特质。它将社会学的、结构性的问题带到了对心理学现象的考量中。^①

二、宏观文化心理学的深入讨论

科学远不止于记录有意思的经验联系，诸如把一个国家与饮食失调的流行联系起来，把性别的社会不平等与数学能力上的性别差异联系起来，或者把政府的住房就业政策与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联系起来。科学还要求解释：（1）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有逻辑的必然联系。例如，达尔文解释道，在特定的环境下，动物必定形成特定的解剖学和行为形式。（2）为何存在这种联系——联系双方彼此提供什么，彼此需求什么？（3）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机制，这被称作解释性建构。在自然科学中，它包括基因、酶、自然选择、重力和血液细胞等。在社会科学中则包括社会角色、图式、字义、模仿、享乐主义计算、协商、经典条件反射、剩余价值、交换价值等。它们解释了一种元素为何及怎样影响另一种元素。重力解释了苹果为什么落在地上；酶解释了某种食物为什么及怎样影响身体健康和成长；模仿和条件反射解释了父母的行为如何对子女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而，大部分社会科学并不关心这些问题。它们往往满足于指认某种经验联系，然后集中于统计过程以测量这种联系的强度。前述的三个例子并未探索一项完整的、真正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三个关键问题，它们只是宏观文化心理学的说明和例证。跨文化心理学同样未能从经验描述推进到科学水平，对此我们不作展开。^②然而，关于上述（1）和（3）的讨论，将加深我们对下文研究的心理能力的文化本质的理解。

（一）宏观文化因素与心理学之间有机的、有逻辑的必然联系

文化心理学家有责任阐明心理学与文化之间必然的、有逻辑的、内部的一致性。就上述三个例证而言，我们需要研究，饮食失调为何以及如何支持了日本的现代化？饮食失调在哪些方面反映并强化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系统中，饮食失调如何是必需的、必然的、有逻辑性的、不可避免的行为？谁受益于这种整合过程？谁是操纵者？饮食失调是怎样增大他们的利益和权力的？从这一视角看，饮食失调就不再是偶然的或者反常的，它并不是不受欢迎的，相反，饮食失调有益于某些社会群体，这是对其激增和持久的唯一解释。对饮食失调这种心理功能而言，必然存在相应的社会动力、支持和益处。

这同样适用于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它与性别的社会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意味着，数学能力差异必定被那些性别的社会—政治差异所激发、支持并为之所用。文化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探寻这种激发、支持和功效究竟为何物。

类似地，只有在涉及就业、住房、汽车和消费主义的社会政策生效的时候，一种中国人的个体主义自我观念才能被培养出来。这些政策激发了个人主义的自我观念，而且，这些政策被那些强调和赞扬个人主义自我的模范和价值观所补充。这发生在娱乐、个性化教育、社交媒体的个性表达和其他社会领域中。个人主义自我观念的缺乏会使民众不能适应和参与新政策的推行，这就是为何社会领导者必须注意培养与宏观文化因素相匹配的心理现象。

我们如何解释宏观文化因素和心理学/主体性之间这种具有逻辑的内部一致性和共生关系呢？宏观文化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心理学是激发和引导社会行为的主观过程，是文化的主观方面。所以，心理学与宏观文化因素必然是具有一致性的。

我们可以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解释这种关系：心理学适应它的环境，即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心理学必然要有一种文化形式，否则便无法生存，该种文化环境也难以维系，因为其成员的行为活动无法维持其原则和动力。文化需要与之相符合的心理学，才能保全文化本身，才能为它的人民谋利，并将其他竞争

① 跨文化心理学家从不讨论具体的文化因素，他们坚持研究缺乏具体政治内涵的抽象因素，诸如“宗教狂热”“集体主义”等。

② 更多讨论参见：Ratner, C.,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nd*. N.Y.: Oxford, 2012.

文化的侵入扼杀在摇篮里。因此,心理学又是一种文化势力。个人主义心理学自然会反对集体主义的宏观文化要素,就像自由主义的心理学会反对社会专制一样。所以领导者才会努力对心理功能,诸如自我概念、动机、愿望、情绪和想象等施加管理。这种宏观文化心理学原则加深了我们对文化与心理学之间联系的理解。

(二) 解释性建构 / 机制

另外一种科学要素是解释性建构和机制的构成。它将宏观文化因素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上述联系尤为必要。这些解释性建构必须将两者的联系纳入其定义之中,同时必须突出和再现这些联系。在使用这些建构时,它们必须与这种联系同时呈现,并被这种作为建构的联系(link-as-construct)所引导。

宏观文化心理学的一个有用的解释性建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986)提出的“文化资本”。正是在社会中流通并具备价值的文化能力和敏感性使人取得社会优势和成就,同时标示着社会地位和从属关系。文化资本类似于经济资本,但它意味着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它包括艺术品位、建筑风格、室内设计、住宅区位、汽车品牌、文化水平、计算能力、时尚风格、技术设计(iPad、智能手机等)、技术造诣、谈话技巧、外国语言、饮食烹饪甚至体形等。这些方面都可以被培养出来,以作为可以获得社会成功的投资来使用。就像金钱一样,它们都是社会地位和社会可承兑性的指标。

文化资本的这些例子都包含了主体性(subjectivity),并将主体性对象化,同时塑造了这种主体性。基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资本,一个人必定会培养出与之相应的心理特征,据之穿衣、讲话、阅读、居住、旅行。为了利用文化资本提高文化能力,个体必须要培养一整套特定的心理能力,包括知觉、自我概念、敏感性、意愿、感觉、情绪、记忆、推理、冲动、动机和期望等。因此,我建议将文化资本扩展到包括所有的心理功能。所有心理特征都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心理特征首要的解释性建构。这一建构强调的是文化和心理学之间的有机联系。

文化资本将心理特征/主体性视为完成适当的、功能性的社会行为所必需的能力。心理功能就是文化能力。作为必要之物,它们为文化参与做准备,并顺应文化参与。心理功能包括了文化元素和价值,表现了文化因素的内涵与风格,同时也以这些方式传播了文化因素。对知觉、自我概念、敏感性、意愿、感觉、情绪、记忆、推理、冲动、动机、想象和期望等来说都是如此。而自传式记忆和性存在也属于文化能力。^①

文化资本是关于心理现象的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概念。它将心理特征解释为一种文化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维持社会的结构、准则、动态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过程中被产生、规定、管理和渗透的,同时它还服务于这一过程。个人的和自然的心理建构则辅助于文化建构,并为其所构造。

心理特征不是一种源自个体本身的个体现象,它并不被个体本身引导,也不表达和提升个体本身。相反,布迪厄告诉我们,“能力或天赋是时间和文化资本投资的产物”,“把学业成就和文化资本在阶级与阶级派系间的分布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打破成见中固有的假定,即认为学业上的成功或失败是自然能力的结果”。(布迪厄的这种观点已被文化神经科学研究验证。它发现心理能力的皮层加工是受文化激发的,同时也被文化支持和组织,并发挥文化的功能。^②)

诚然,很多文化能力源自作为“想象的个体”的个体的发明。然而,在它们被对象化、被改造、被管理、被分配时,它们就开始被宏观文化因素所占据。其依据正是文化过程、准则和动力学——盈利能力、销售市场、地位和竞争。只有那些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有用的能力才可能成为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乃是经济资本的衍生物,经济资本构成了诸如艺术品位乃至体形等文化现象的形式、内容及分配的基础。经济资本是“一种固有的法则,即潜藏于社会世界固有规定之下的原则”。同时,文化资本又不可被还原为经济资本,因为文化资本拥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比如艺术的、知识的和感官的。

^① Ratner, C.,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Its development, concerns, politics, and future direction”, In M. Gelfand, C. Chiu, Y. Hong (Eds.), *Advance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vol. 3, chap. 6).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参见 Lende, D., & Downey, G., *The encultured brain: An introduction to neuroanthropology*, Boston: MIT Press, 2012.

巴洛克式宫殿中的一顿精致的法式晚餐显然远非金钱交易可比,然而它是被用餐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所结构化的。对于时髦的技术设备,诸如 iPad、iPod、智能手机和赛车等来说也是如此。其时髦的特征也远不止于金钱,而是来源于一种基于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文化资本和货币财富一样,都是社会地位的指标,而且两者是高度相关的。

经济资本将不同的文化形式统一在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中,但这一系统由于其形形色色的外表,并不显而易见。“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类型的资本的根源”,其他资本只是经济资本的改变的或变相的形式^①。

文化资本反映并巩固了经济资本,由此,沿着社会阶层分界线就产生了文化资本和文化能力的人口统计学分布现象。故而,文化资本就可以根据不同群体中或特定群体内部个体所能获得的文化资源、可供性和障碍来解释其心理特征上的个体差异。

心理能力的人口统计学构建依赖于两个条件:(1)将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文化资本分配到不同的社会位置中,其中包括教育资源、师资培训、教育学以及教育内容。^②(2)要求将是否拥有特定形式的文化资本作为获得社会位置(如大学、工作、住房)的资格。这些要求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它让那些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进入,而将其他人拒之门外。

不管是文化资本的分配,还是对拥有文化资本的要求,都受到社会领导者的控制,以此来保护其经济财富和权力。比如说,沃尔玛和其他公司这样的资本所有者控制着美国的一种新型学校,即所谓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他们资助学校,控制教师教育,并向学校提供师资。他们还捐款以对管理特许学校的当地教育委员会施加影响。自2000年起,沃尔玛/沃尔顿基金会已经在全国范围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教育资助。华盛顿特区一半的学生都在特许学校上学,在这里他们学习沃尔玛的文化资本。^③

文化资本反映并巩固了一个阶级分化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层阶级——它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得到的文化资本也是处于劣势的,这与其在经济资本上所处的劣势相符合。这些群体被取消了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资格(由此可以克服对他们的剥夺),这就加剧了对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剥夺。

文化资本并不是一种普适的文化-心理发展和实现的一般的和理想的机制。它并不是自动地、随意地被支付给每个人的。文化资本不是用来帮助改善个体不足的“脚手架”,恰恰相反,伴随着经济资本被剥夺的趋势,它反而常常会制造出个体的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剥夺机制和功能必须成为文化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些机制和功能弥漫整个文化领域——教育、新闻、娱乐、广告、流行艺术、工作、宗教、信息、政治、选举等。^④对这种文化资本的剥夺机制和功能的指认,恰恰纠正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观念,即认为文化因素是政治中立的,而且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而“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正是这样一种建构。^⑤

对于占据了金字塔顶端的社会领导者来说,其主要任务就是调整人们的文化资本和文化能力,以反映和巩固其政治经济地位。布迪厄说得很好:“如果欲使对群体的合法代表权的垄断地位的内部竞争不致威胁作为该群体的根基的资本的保存和积累,该群体的成员就必须对宣称自己是群体一员的权利的获得条件进行规范。”

文化资本的这些具体内涵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的解释性和描述性的建构。重要的是要理解理论建构的本质,及其如何加深或削弱了我们对社会与心理现实的理解。通过“文化资本”来描述和解释心理学现象,必然会使所有这些文化内涵与心理学发生关联。这一建构吸引我们去考察经济资本的客观社会现实、政治

① 参见 Lende, D., & Downey, G., *The encultured brain: An introduction to neuroanthropology*, Boston: MIT Press.

② 参见 Weis, Cipollone, Jenkins, 2014.

③ “A Walmart Fortune, Spreading Charter Schools”,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14.

④ 文化-心理的剥夺与限制是随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加剧的,这被称为“累积赤字”。它指的是一种事实:与那些得天独厚的儿童相比,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下层儿童的文化-心理不足会以指数方式增长。它并不会在那些得天独厚的同伴后面保持固定距离,而且这种距离也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缩短。

⑤ 文化因素可以以有益的“脚手架”的形式存在。但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能得到支持:民众财富和政治权利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社会资源的集体化和共享、心理上的满足。假如没有这些,则所谓文化因素是有益于促进个体完善的“脚手架”,就是故弄玄虚的花言巧语了。

经济学、社会金字塔结构、不同文化领域的整体社会体系、文化因素反映和巩固政治经济的方式,以及心理学的具体文化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化和功能。而其他文化概念,如图示、模板、集体主义表征、中介方式、词义、最近发展区、社会角色等,都是抽象的和中性的,它们并不会规定社会和心理学的具体细节。但是我们可以为其增添具体内容,比如谈论被剥削的工人的角色,或者文化图式的意识形态内容。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①然而,抽象的建构同样也避开了具体的文化-心理学现实——这正是大多数文化心理学家所做的。

宏观文化心理学这些相互关联的科学准则使我们可以超越经验联系,帮助我们理解、解释、描述和预测宏观文化要素为何及如何在心理现象的形式、内容和分布中表现出来。而要解释和描述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能力方面的群体差异,这个理论体系正是最好的框架。

三、语言能力群体差异的宏观文化分析

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下面这两段来自美国某个一年级课堂的叙事展现出来。^②第一段呈现的是一个白人女孩与她的中产阶级老师的对话,第二部分则是一个黑人女孩与同一个老师的对话。我们将检视在这两段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语言能力。

(1) Mindy: 这些蜡烛是我们露营的时候做的。

Mrs. Jones: 你做的?

M: 嗯,我还尝试了不同的颜色,但只有一支有颜色,这支是蓝色,另一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T: 真棒!快告诉伙伴们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假装我们对蜡烛一点也不懂,好吧?说说你最先做了什么?

用什么做的?面粉吗?

M: 嗯,这有一些热蜡,真的热,你只要拿一根线,在里面打个结,然后把线浸在蜡里。

T: 那它的形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M: 嗯,把它弄出一个形状就行了。

T: 哦,你用手把它捏出形状的是吗?

M: 但是你要,首先要把它固定在蜡里,然后是水里,然后一直这么做,直到做出你想要的形状。

T: 好,那么谁知道线是干什么用的?

(2) Deena: 嗯,礼拜天我去了沙滩和麦当劳,还去了公园……我得到了这个生日礼物。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嗯,过生日的时候我还得到2美元,我把它放这里了。然后我去找我的朋友 Gipi 了。我和她还去了我外婆家,我还背她玩。我,我们在我家附近走了一会,嗯,她很重。她上六七年级了。

Mrs. Jones: 好了,我要打断你了。我想讨论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你刚说的对你来说也许重要,但你得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事情,你能做到吗?告诉大家你去了哪片沙滩?

这两个小学生展现出了不同的语言表达能力,老师对两人的反应也不一样。Mindy 的语言很有表现力,她始终围绕着同一个话题,用一般性的语言来描述,让别人清楚发生了什么。老师也跟着她的思路,引导她提高描述的明确性和一致性。对话双方一来一回,彼此之间有适当的回应。而 Deena 的讲述则漫无边际,各主题间缺乏明确联系。她还没有展开自己的想法和词汇,就跳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上,结果听众就不清楚每个主题的意义。老师明显没有跟随 Deena 的思路,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参与或引导她的谈话。相反,老师任由她陷入困难,然后粗暴地打断她,还无礼地暗示其谈话并不重要。

宏观文化心理学通过宏观文化要素和心理学之间的有机整合来解释心理差异,而这种整合是由文化资本、文化能力、最终是经济资本这样的建构凸显出来的。女孩的表达性语言是一种文化能力或文化资本,是由她们在经济资本中所处的位置形成的。它不仅反映了这种位置,也维系了这种位置。通过把个体置于

^① Vygotsky, L.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Boca Raton: St. Lucie Press, 1997.

^② Michaels, S., "Narrative presentations: An oral preparation for literacy with first graders", In J. Cook-Gumperz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5, pp.108-109.

既有的社会角色中，他们的语言能力维持了自身的阶级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文化的力量会努力建立并强化这种心理差异。（Michaels 并没有明确说明两个女孩所属的社会阶级，但她们的对话风格说明 Mindy 属于中产阶级，而 Deena 则属于下层阶级。）

认识到语言是一种文化能力和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的一种必然延伸，将我们引向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其中 1% 的精英分子拥有和控制着 35% 的财富。对高企业利润的需求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贫困和不擅长。美国就业中增长最大的是服务型（如餐饮、旅游、医护等）和临时工作。

正如布迪厄所强调的，这种经济结构要求有一种互补的文化和主体性。上层阶级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和心理特征，使之能设计、实施和控制主要社会问题。中产阶级也会拥有其中一些能力，以便协助上层阶级，但同时又必须接受其从属社会地位带来的心理限制。而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则会形成一种极其受限制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并不得不接受来自上层阶级的权力和控制。

这就解释了两个女孩在心理能力，特别是交流能力上的差异。Deena 的对话风格是碎片化、私人化的，而这正是她所处的文化的特点。下层阶级的生活常常被愚弄，易变而不稳定，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测，还会被突如其来的各种生活危机如失业、贫穷、无家可归、疾病、犯罪、家庭暴力和监禁等打乱。这种生活被困于此时此地，被困于其直接性。人们对自己遭遇的困境缺乏控制力，因而也就很少有机会（或者理由）去规划未来。这就是为什么 Deena 的话语会在不同的主题之间快速地跳跃，缺乏连贯性。这也是为什么她所提到的事物都是直接在场的，而不是超越其当下情境的抽象物。她不能使用抽象的术语，以同一个局外人（比如老师）进行交流。

Deena 的表达能力使她只能从事下层阶级的工作。这种能力适合在麦当劳里翻动汉堡或者当店员，适合告诉顾客巨无霸里面有生菜、西红柿、洋葱和奶酪。这类工作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只是将单子上的词汇串起来。逻辑性、连贯性和描述性都不需要，因为相关信息已经整整齐齐地显示在头顶的屏幕上，而顾客也清楚这些词汇的含义。工作和讲话都已经被程序化和简单化到店员不再需要思考、反思、分析、逻辑、创造力或解释力了。这些高级水平的活动都已经被公司老板和经理人剥夺了——就像他们剥夺利润一样。这些人不希望下层阶级的雇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拥有自身，所以他们阻碍雇员组成工会，以参与对事务的分析、评判、计划和讨论。这就是下层阶级语言的压迫性的文化基础、要求和功能。

相反，Mindy 的表述特征是由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所规定、塑造和激发的。它与后者一致，并有助于后者。这包括对宏大问题（世界政治、跨国贸易）和抽象问题（货币兑换率如何影响商品出口）的推理、对未来事件的规划（下一年的商业计划或研究项目）、分析个人或商业活动的多种可行性、运用抽象概念与世界各地同事进行交流，并具体描述那些不能直接感知的事件。上文中的老师 Jones 所要求和强化的正是这种语言和认知能力。

文化资本使我们认清了心理学和社会之间必然的与合乎逻辑的相互依赖。当然，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并非对每个人都是铁板一块，不少个体也会经历向上或向下的文化—心理流动。（官方声称文化因素被设计出来以赋予民众更多权力，使其更为富足，但社会流动性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减少，驳斥了官方的这种说法。）但 Deena 和 Mindy 仍可作为布迪厄理论的一般分析的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老师 Jones 扮演的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中介，她鼓励 Mindy 这样的中产阶级的学生习得并操演中产阶级的说话方式，同时阻止 Deena 这样的下层阶级学生获得这种语言能力。她并没有帮助 Deena 掌握说话技巧，她与 Deena 的交流是脱节的，而且暗示 Deena 不能学会适当的交流方式。这样就把 Deena 更加牢固地捆绑在了本就低下的阶级位置上。Jones 就是这种通过语言标记强化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文化中介。^① 她与 Deena 的交流并不是用以从下层阶级爬出来的脚手架或最近发展区。Jones 反映出的是阶级社会对下层阶级个体的要求——这些人在心理上适应了那种社会宿命，而且还缺乏从这种宿命逃离的文化资本。值得注意的是，

① Ratner, C., *Cultur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Method*. N.Y.: Plenum, 2002, pp.19–20.

仅仅在一个班级的课堂上,老师 Jones 就完成了这种阶级分层。

文化资本最终由经济资本所塑造,语言能力上的个体差异反映了由于所能获取的文化资本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这是对能力差异最为准确和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就提高心理能力并使其平等而言,它也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它为促使社会的宏观文化因素更加人性化做出了最佳的心理学贡献。对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展开讨论。

四、宏观文化心理学对心理学的提升

吊诡的是,通过指认文化-心理中存在的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宏观文化心理学在改善社会和心理方面具有十分诱人的前景。它促进我们思考如何改革文化因素,以使它们更有益于民众的能力。而社会科学往往忽略了具体的文化,对如何实质性地促进社会进步乏善可陈。因此,对宏观文化心理学的接受程度恰好可以表明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赋予民众权力,并造福他们。

文化资本并不是一种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给人们的自动的技术能力。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的附属物,它的获得必须要先有经济需求和政治意愿的支持。在这方面读写能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读写能力的分布与经济活动的联系最为紧密。读写能力集中在那些经济活动中特别用到读和写的地方,在对读写能力有经济需求的社会群体中,读写能力也同样发展起来了。农民群体的读写能力要比商人群体差很多,而单看农民阶层,在商品粮种植者和家庭自给的农民之间,在向城市供应肉类者和高地或沼泽牧民之间,也存在着文化、教育和经济上的差异。^①只有在对读写能力有实际的经济需要时,读写能力的教育才能真正见效。对于那些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并无读写需求的人们来说,鼓励他们去提高某种他们漠不关心、无实际用途的能力,只是一种徒劳。

据此可以推断,民众心理能力的提升要求将它们转变为被政治经济所需要的一种文化能力。如果某种政治经济状况对文化能力和心理发展的需求减少,那么改善的途径就是去改造这种政治经济状况。单凭教学技术本身无法克服政治经济情况对心理能力发展造成的阻力。

要想做富有成效的教育者和学者,就有必要勇于走出象牙塔,成为致力于改变社会的活动家。

我们对心理能力的讨论揭示出,对心理的科学理解和改善社会密切相关。好的科学与善的政治是相互依存的。

(责任编辑:盛丹艳)

^① Ratner, C., *Cultural psychology: Theory and Method*. N.Y.: Plenum, 2002, pp.23-25.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According to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Carl Ratn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ticulates a new way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To do so, it advances a psychological theory known as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This theory construes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as cultural phenomena. Their basis, character, level, soc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derive from macro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institutions, cultural artifacts, and cultural concepts. The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is illustrated with a case study of expressive linguistic competencies (discourse) manifested by majority and minority subcultures in the U.S. This analysis extends to explaining how linguistic competencies can be enhanced. We show how psychological enrichment depends upon reforming macro cultural factors that form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social reform complement one another.

Key word: macro cultur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linguistic competencies